



孙照国、王天义、吴栋、白雪秋、吴昀国、孙启明、邵丽华等参加研讨会的部分专家学者

# 大国转型的必然选择

■ 章昌裕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与世隔绝状态下艰难起步的,30年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不仅铸就了中国的经济大国地位,而且逐步向世界展示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胸怀,但要真正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唯有成为强国才能担当。只有强国,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世界并能承担起责任的保护能力,为此,我们再次面临选择。面对开放的世界,审视当代国际经济合作出现的一系列新特征,可以认为,融入相互依存的世界和全要素运动,以开放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是实现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 强国选择

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发布《2020年的中国》报告时就认为,21世纪中国将保持快速发展,21世纪上半叶将成为经济大国。该报告同时预测,到2020年,世界上7个最大经济体将重新排列,将会有5个亚洲国家隶属其中,中国位列第一。事实是,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5878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国家外汇储备2.8万亿美元,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超越英、法、德成为第三大股东,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057亿美元,连续18年位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主要经济指标表明,中国已成为比肩世界经济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1998年就曾说过,中国走出了一条体制改革稳步推进与经济增长独特的发展路子;在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和各类高级谋士中间,大概还形成了这样的概念:中国经济的成功,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最重要的事件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事实上,中国在经济腾飞的道路上一直扮演着超越者的角色,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全世界最大出口国,2010年8月又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人们又在关注中国何时超越美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中国

如何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才是更加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关于强国定义、强国标准以及中国强国之路的讨论就已展开,笔者认为,强国首先可以理解为在国际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强国不仅拥有巨大的资源和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在国际社会中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其次,以哲学和经济学基本观点看,能够在国际关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非此之外的所谓政治强国、军事强国、文化强国等皆为无稽之谈。第三,强国不是自封的,更不是在精神世界里靠自我陶醉形成的,强国一定是在开放的世界大家庭中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公认的。

除去各种历史偏见外,可以看出,全面开放并主动与世界融合,积极参与资本运动并获得世界话语权是强国之路的共同途径。《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10月11日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强国地位有三种标志:力量以及基于力量的服务能力和保护能力,综合看这三种标志的关系是,没有力量一切无从谈起,有力量只提供保护而不提供服务,可能会变成逃避责任的经典现实主义,最终导致自己提供的服务无人问津,有力量只提供保护而不提供服务,则只会变成到处索取保护费的恶邻居”,“中国正呈现强国的三大标志,即力量以及基于力量的服务能力和保护能力,实际也就是从获得力量到合作性运用力量再到引领性运用力量”,显然,历史和现实都将中国推向了一个新的选择点上:尽快实现由大国向强国的转变。

## 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

相互依存理论提出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当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趋于全球化后,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势力相互制约,最终谋求形成一种势力更强的国际经济同盟,经济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政策协作是十分必要的。而中国要想在发展中由大变强,全面融入国际

经济合作是必然的选择。

### 1. 坚持开放、内外联动、互利共赢

坚持对外开放,走开放大国道路是中国的长期国策,但大国向强国转变首先在于能否处理好自主发展与世界互动的辩证关系。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同世界建立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更需要做好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与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保障,也是进一步同世界建立相互依存关系的最重要条件。自主发展与世界互动的辩证关系应得到正确处理,在新的发展中不可畸轻畸重,内外联动说明应抓住世界多极化带来的机遇,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从相互依存出发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促进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经济整体实力提高。在互利共赢中不仅承担“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更要提高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用自己的发展和负责任的态度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在全面参与国际多边合作中更多地考虑彼此利益;在安全高效中参与全要素合作不仅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而且要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构建有效的国家经济安全体制机制。

### 2. 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和国际决策机制

以大国姿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决策合作机制,包括制定和修改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安全规范,引导和推动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重要作用。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中国的强盛不可避免会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均势,也会引起一些国家抵触情绪提高(尤其是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如果采取一些单独行动时,国际上通常会将对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不可避免也会涉及一些国际政治敏感问题,在设计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与世界经济互动,建立更深入、更广泛的相互依存关系战略蓝图方面,中国必须从自身国情以及发展条件和需要

出发,同时根据世界发展大势和与各国优势互补的可能性以及充分考虑一些国际忌讳,去制定切实可行和趋利避害的长期经济成长方略。

### 3. 以投资促进创新全球资本合作

20世纪发生在全球经济领域中的最重要事件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和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则。以资本为引领的生产要素国际运动和全要素合作趋势要求中国必须尽快实现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创新,走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道路,以投资促进创新全球资本合作方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高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当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概念皆应成为过去,历史经验证明,资本输出是强国之路的不二选择,在以资本运动引领下的当代全要素国际经济合作中,从传统的“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廉价劳动换技术”过渡到“资本换技术”,以投资促进创新全球资本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提高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

### 4. 加入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构筑贸易强国

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转移和出口鼓励的外贸政策,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距离贸易强国还相差甚远。作为贸易强国,第一,应是经济大国;第二,出口产品生产处于国际分工微笑曲线两端位置;第三,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高且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第四,拥有国际贸易主要产品定价话语权;第五,是国际贸易规则的主要参与者和制定者。这五项指标,除了第一和第五两项中国已基本做到,其他三项还差很多,为实现大国向强国转变,在新一轮全要素合作中,只有加入到新的价值链国际分工体系中,以结构转型升级为导向,以资本输出延长加工贸易价值链,培育新的要素优势,以全要素合作推动对外贸易创造效益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提高,是实现贸易强国的出路。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经济学思想演变为“华盛顿共识”政策并扩散到各国,是国际金融危机及当前全球经济动荡的理论根源。由此,作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政策对中国的影响进行论析,并且认为,因这次经济危机将可能导致经济学思想的变革。

# 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国际金融危机

■ 田春生

新自由主义从美欧国家的一种经济理论演变为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从而导致这一理论与政策乃至思潮在全球泛滥,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动荡的一个深刻根源。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和本次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有关;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问题在于:为什么以“金融危机”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频繁地爆发,为什么金融危机的后果如此严重并引发全球主权债务危机?它们的性质一样吗?

## 何为新自由主义政策?

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内涵与作用,各国学者的看法各异。总的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该学派试图证明市场调节经济的必要性、合理性与优越性,批驳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进而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缺陷。

经济全球化是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更大规模的经济扩张,而新自由主义成为本轮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伴随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向各国的延伸,新自由主义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全球扩散,使各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学说演变为西方世界的经济政策与行为范式,并首先在美国和英国以及一些拉美国家推行,以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出笼为标志,新自由主义由一种经济学说逐渐演变成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其核心可以被概括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学说演变为经济政策,是国际金融危机乃至当今全球经济萧条的深刻根源。本文认为,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学说演变为经济政策,并在全球得到推行,其标志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出世。这之后,华盛顿共识很快成为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经济和全球化的共识,它不仅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起了作用,更对俄罗斯和东欧的转型政策产生严重影响,其转型的“休克疗法”经济政策,则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的体现与结果。这一经济政策,它不仅代表国际社会上资本阶层的利益,本身也反映了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政治主张。“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拉丁美洲国家、俄罗斯和亚洲一些国家与地区,“华盛顿共识”政策的推行都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反而受到各国各方的谴责与抨击。可以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政策多年影响和推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 “华盛顿共识”政策与国际金融危机

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学说及其政策的推行看,其经济政策对各国经济都产生影响,它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在全球经济最为脆弱的领域——国际金融领域所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乃至当今全球经济萧条和“无解”,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学说及其政策的一个结果。

私有化政策是新自由主义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及产权经济学等学说的影响下,国有企业私有化被认为是解决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唯一出路。在发达国家,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在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有80多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对6800家国有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仅墨西哥政府就卖掉数以百计的国有独资公司。

新自由主义自由化政策在金融领域得到了充分释放。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学说开始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政府不断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最终导致流动性过剩,大量的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演变为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

资本的全球化和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体现。从全球资本市场看,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导致各国间资金的不足与过剩并存,又由于当今社会的高度信息化,造成国际资本频繁在各国游走,被称为“游资”或“热钱(Hot Money)”,具有投机性质的短期资本在新兴市场国家以大资本吃小资本的方式逐利。造成近10多年来新兴市场不断出现金融危机,本国货币的通货膨胀。新自由主义政策要求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和失业保险金等政府补贴,从而减少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是西方国家政府经济改革的政策。以美国为例,其在里根时期通过的经济复兴计划的预算支出法案,在1982年削减社会福利支出325亿美元,1983年和1984年再分别削减440亿和514亿美元。之后,美国国家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能力在下降。有估计认为,美国最富的1%占有全国财富已升至40%,而生活在贫困线下人口比重升至15%之上,乃半个世纪以来最高。有4000多万人因无钱吃不饱,而接受美式粮票(food stamp)救济。危机之后,中产阶级面临破产、裁员和破产,底层蓝领阶层面临失业。因泡沫经济推动的经济发展,一旦虚假消费繁荣破灭就是经济衰退之始。这也是引致当前美国“占领华尔街”风潮的原因之一。

可见,新自由主义在主导世界经济的20—30年间,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包括国内国际经济政策、宏观经济的经济政策、各种专门政策等等。特别是一些政策已经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被固定和实施。这些政策的核心是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其本质是保护资本的利益和损害劳动者的利益。国际金融危机至今导致全球经济萧条,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和推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农业是关键

■ 钱津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因此,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建设现代农业应是中国当前必须做好的第一重要工作。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最早研究农业与工业化之间关系的张培刚教授曾指出:“在任何经济体系中,农业和工业之间总保持一种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虽然在经济演进的过程中,其方式屡经变异。”从全世界的范围看,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建立在小农业生产结构基础上的。保持小农业生产结构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尤其是不可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小农业生产结构与工业化是相互对立的,不是走在一条路上的。从国民经济整体的角度讲,如果哪一个国家的

农业基础还是停留在小农业生产结构状态,其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就会是步履维艰。无疑,小农业生产结构需要大量农业人口,相应地并不需要特别多的工业产品,农业和农村市场狭窄且脆弱,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工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所以,要实现工业化,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将工作重心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因此,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建设现代农业应是中国当前必须做好的第一重要工作。

关于中国农业的现状与发展,有研究认为:“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安全依赖于杂交种子、复种指数和化肥的使用,今后中国的粮食安全同样依赖于种子的改良、化肥使用的改进、中低产田的改造和复种指数的提高,其中,中低产田改造潜力更大。归纳起来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可以如下表述:耕地资源是安全的基础;国际贸易是安全的补充;技术进步是安全的保障;条件改善是安全的前提。”但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还不是耕地问题,也不是贸易、技术和其他条件的问题,而是劳动主体的转换,即必须培育适应现代农业需要的新农民。

目前,中国落后的农业劳动力需要尽快得到替换,新农民将要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取代原有的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农业的主

力。表明这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青壮年男子大量外出,乡村社会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出现了严重而大规模的两地分居等。由于最优秀的人力资源外流,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乡村社会迅速趋向凋敝,文明出现退化。”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据调查,有些地区“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除了要照顾好孩子们,还要承担全村的农业生产劳动,包括家庭养猪养鸡等所有的活计。”这种农民老龄化和整体退化状况,不用说建设现代农业,就是有意延续小农业生产结构恐怕也难以维系。所以,中国加快转变农业方式,必须尽快制定得力的农业现代化战略方案,从基础制度上作出保障,培育大量的新型农民,让新型农民迅速成为现代农业和农村的新主人。

如果没有足够的新型农民,中国就不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即就不会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这就是说,中国目前需要逐步培育出至少数以千万计的新型农民来接替目前农村的老弱病残劳动力。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性转折。目前,7亿农村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都要从农村转移出来,进入城市或城镇,主要是进入城镇,取而代之的将是合格的新农民和他们的子女。

实现农业规模经营需要新型农民,推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更需要新型农民,一般讲,具有现代文化基础和农业专业知识的新型农民,还需要具有市场经济意识和市场化经营能力。所以,依据最基本的要求,新型农民也应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农民。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首先需要培育新型农民教育。

我们的研究认为:“新型农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目前在农村始终安心农业劳动从未出去打工的青壮年农民,经过短期培训,成功转型。二是出去打过工又回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村知识青年,在社会的资助下,可以接受较为系统的农业高等教育,成为新型农民。三是目前的农民子女,高中毕业后,直接考入农业高等院校,完成学业之后,回乡务农。四是目前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读完大学,到农村劳动就业。五是目前城市家庭的子女,在农业高等院校毕业后,立志当农民。六是城市的青年干部、职工在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接受专门的农业教育,转型为农民。七是一部分农业科研人员,独立自主创业,也成为新型农民的组成部分。八是在第二、第三产业创业的成功人士,将自己的大量资金投入农业,开发现代化的农庄经济,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型农民’。”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